

貧窮文化

墨西哥五個家庭一日生活的實錄

基進・實踐・文化

Five Families:
Mexican Case Studies in the Culture of Poverty

作者／奧斯卡・劉易士 (Oscar Lewis)

譯者／丘延亮

導讀／劉于甄、張少強、丘延亮



《貧窮文化：墨西哥五個家庭一日生活的實錄》

Five Families: Mexican Case Studies in the Culture of Poverty

這本書是五個墨西哥家庭中男男女女、
老老少少日常生活極富戲劇性的有力寫照，
一部溫厚的人類畫傳，
同時是出血性的變遷中文化之嚴謹而權威的記錄。
它提供了今日墨西哥社會的切片，
作者把讀者帶到五個家庭的裡頭，
也領進這些人們的心中，
和小農莊、貧民窟、大雜院
和高級住宅區裡的他們一塊兒生活一整天。
對家庭生活親密而貼切的研究是那麼引人，
對開發中國家隨著
「西化」而來的「文化沙漠」的透露又是那麼嚇人，
還有那劃時代的民族學書寫進向……
真可說是一齣驚人的演出。
讀者從這裡得到其他書裡得不到的、
佔人類全體五分之四的人們可憫的生活經驗，
許是難以或忘的罷！
讀者看完全書就可以知道
奧利維·拉·法濟（Oliver La Farge）
說的卡斯特羅家
「直叫契訶夫（Chekhov）心驚、
更教左拉（Zola）毛骨悚然」是有沒有誇大其詞了！

薛以登·洛曼（Selden Rodman）
《週六評論》（*The Saturday Review*）



ISBN 957-732-203-4



貧窮文化

墨西哥五個家庭一日生活的實錄

奧斯卡·劉易士（Oscar Lewis）著

丘延亮 譯

◎ 巨流圖書公司 印行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貧窮文化：墨西哥五個家庭一日生活的實錄／奧斯卡·劉易士（Oscar Lewis）著；丘延亮譯．--初版．--臺北市：巨流，2004〔民93〕

面：公分

參考書目：面

譯自：Five families: Mexican case studies in the culture of poverty

ISBN 957-732-203-4（平裝）

1. 家庭 - 墨西哥 - 個案研究 2. 貧窮 - 墨西哥

544.1954

93001205

貧窮文化
墨西哥的五個家庭一日生活的實錄

原著：Five families: Mexican case studies
in the culture of poverty

原著者：奧斯卡·劉易士（Oscar Lewis）

出版者：巨流圖書公司

創辦人：熊嶺

總編輯：陳巨擘

譯者：丘延亮

打字：陳紹蘭

封面設計：董谷音

地址：106 台北市溫州街48巷5號1樓

電話：（02）23695250・23695680

傳真：（02）83691393

郵購：郵政劃撥帳號01002323

e-mail: chuliu@ms13.hinet.net

http://www.liwen.com.tw

總經銷：麗文文化事業機構

地址：802 高雄市苓雅區泉州街5號

電話：（07）2261273

傳真：（07）2264697

出版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1045號

ISBN：957-732-203-4

2004年4月初版一刷

定價450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本書如有破損、缺頁或倒裝，請寄回更換

「基進・實踐・文化」系列書序

夏林清

「如果我相信社會公義，卻不實踐它，那便只是空想。你得是一致的，這就是我對方法論或技術不那麼感興趣的原因，我寧可涉入到一個過程中，這個過程是整個人、整個視野和整個現實的投入。」（Myles Horton）

「基進・實踐・文化」書系的目的是為了記錄草根運動的經驗。Myles Horton的一小段話勾勒了「基進實踐」的意涵。在過去18年中（1986~2004）一小群、一小群的年輕工作者，投入到工人、婦女、教師與青少年的社群中，和他們一起面對社會的不義與不公；不論他們表達參與的形式是激烈的抗爭、強力的倡議、溫和的溝通、細緻的教育還是藝文展演，他們都是文化的創新者。文化是人民生活內涵的淬煉表達，基進實踐的社會過程是另類文化生產的土壤。

此刻的台灣，大家對政黨政治的認識與知識或許混亂但並不匱乏，然而對被階級、性別與權力區隔的人民生活的了解，卻是斷裂失真與狹窄僵硬的。「基進・實踐・文化」書系有台灣的實作成果，也有翻譯國外的好書，籌劃與出版系列的書籍，也是深化基進實踐社會過程的一個作法。希望能與相信社會正義，而且在不同領域用不同方式實踐的你，發展連結與對話的空間。

這樣的團體，一個受過良好訓練的學者，可能遲早會得到一個合於科學要求的總結；儘管他自己的主觀因素不能完全給排除掉。可是所考察的社會愈大，數量愈多，研究者想要整體的觀察和了解它就愈近乎不可能。這種人情味十足的，面對面接觸的方法，受到了數量上及種類上（通常兩者都有）的嚴格限制。

至於社會學家，他們自始就將興趣集中於現代的都市社區方面，大量的依賴著統計分析（statistical analysis）的方法。然而，我們研究人類底無限多樣性的時間愈久，我們就會愈明顯的認識到，它們實際上不能被套進那種作為數理運作資料所必須的特定嚴格要求裡面，即使是放在今天計算機容納性比較大的範圍裡也辦不到。這麼一來，好些地方就不能沒有來自個人觀察所得到的解釋；當然，也就免不了帶著種主觀情緒和偏見的弱質了。

近來，不少研究民族的學者求助於各式各樣的客觀援手，最重要的就是應用一些心理測驗（通常被很幽默的稱做「排炮」），而且儘最大可能的應用統計學。即令如此，歸根究底，要是他的發現要能多少有點用的話，也一定要有人用帶人味的話來解釋它們，一定要有人注入一些說明性的東西。

各種社會科學理應教我們能夠了解世界上的各民族，以使我們在具有重要意義的實際行動中得到指導，然而，由於上述的困難，遂無法滿足我們對這種指導明顯而日增的需要。人類學家再也不能夠安然地完全避開這個大世界，這個由各式各樣的軍人、外交官、政治家作無情介入的世界。正如劉易士博士在頭一章裡指出的：「由於人類學家們的努力，很多美國人對於新幾內亞的一些孤立文化（總共只有五百多人的）有很深的認識，另一方面卻對於像印度、墨西哥及其他低度開發國家——而這些國家在國際舞台上注定要扮演極重要的角色——裡面成百萬鄉村居民的生

活方式一無所知，這真是一大諷刺。」換句話說，這也就是對絕大多數人類的無知。

本書作者對於五個墨西哥家庭一整天生活的研究，就是試圖用深入樣本的方法提供我們有關那千萬人們生活片斷的一幅生動畫面。他的手法和絕大多數民族學的田野工作一樣客觀。記錄的本身，除了作者一些公開的、劃分得很清楚的章節之外，沒有寓意、也不作結論；同時作者更以最大的自制力避免作任何批評。他只單純的把五個日子鋪陳在我們面前，是五個作代表的普通家庭裡面完全正常的日常生活。就算不得已的，這些家庭給「小說化」了；這也絲毫無損於這個報告的價值。同時，也同樣無法避免的，在作者作觀察的眼睛背後存在了他自己人格的過濾器；這是在社會科學和其他科學裡都免除不了的主觀因素。

我們要看到的當然只是有關墨西哥的圖畫；然而，即令這些圖畫不能適合整個的墨西哥，它們也還是有它們的普遍價值的。如劉易士博士指出的：這本書舉例說明了迄今少為人知的「貧窮的動理學」(dynamic of poverty)。對我來說，這些家庭中最令人關注的事物是他們的愁慘 (*malaise*)，他們之間快意與滿足的罕見，他們的缺乏情愛。坦率的情愛（除了在為時甚短的追求與新婚期間外）或我們通常意味著「愛」(love)的那種東西，在世界上這些貧困質樸的人們中是少有的。最重要的是，只要飢餓和不適繼續宰制人們，他們就沒有表達溫文、和暖及較為不勢利底情緒的多餘精力；他們就少有實際快樂的機會。可是，這樣的概括並沒有能全部說明了這裡所描述的人們地性格；我們也許會注意到，最陰沈、最缺乏愛、最懷恨意的就是暴發戶卡斯特羅的家庭，這些都被作者以一種壯觀的、近乎殘酷的坦率表達了出來，直令契訶夫 (Chekhov) 心驚，更教左拉 (Zola) 毛骨悚然。

這些都公道嗎？我們能相信嗎？我們能把這些一再呈現的、在不斷敗壞中或已經腐朽了的宗教、破碎的家庭、婚外性行為、通姦和習以為常的多婚制視為特色而接受嗎？我想答案可能還在其他方面。這書裡幾個家庭所包括的人，他們的文化都在我們所謂的「變遷」中，這意味著在科技年代（Age of Technology）的猛襲之前，他們的文化已經陷入困境。歐洲—北美系國家的最大輸出是一種新的物質文化，它粉碎了它所及之處所有民族的非物質文化；時至今日，已經沒有一個民族可以倖免。整個世界，人們憎恨著白色人種以及代表著「機械世界」的國家，可是又一邊忙著模仿他們。他們得到的第一個回報就是「文化荒漠」。

我們再回頭看看卡斯特羅家：他們獲得了一種北美的物質文明，他們有一輛兩種顏色的汽車，有自來水，甚至吃的是北美式的早餐；晚上卡斯特羅太太也蜷伏在床上看北美暢銷書的譯本。但是，他們並未進入北方的文化，他們不過是從其來有自的沃土中被連根拔起，被分離開去；除了得到了些物件（objects）外，沒有接受任何可資替代的東西。他們只是響亮的喇叭和叮噠作響的鑊鉞，沒有愛，對什麼都沒有敬虔。

我所談到這種愁慘正擴展到整個的世界。最起碼，貧窮底動力就有一個部份在於這裡；許多許多的例子表明：只要一個民族被絆住在那與「科技年代」不可分的經濟底蜘蛛網裡，一種舊的、在個體上是滿足的、**原始**的存在就被另一種不能滿意的、**赤貧化**的存在所取代。同樣具有代表性的是，文化的衝擊導致了社會基本單位——「家庭」的崩潰。雖然在這五個家庭裡的第二、第三和第四個裡面，我們有趣的注意到他們結合樣式底持續顯得多麼強而有力；但是，這樣的結合實際上卻是一些由崩潰所產生的碎片重新奇特地補綴起來的東西。

激烈的文化變遷——尤其是在家庭與宗教方面特別顯著——在新時代的核心國家（譯按：指西歐北美工業化較早的國家）中也同樣發生，儘管它們在一個半世紀前已經開始經歷一個比較漸進的變遷，可是，那些也都不過是「工業革命」以來才發生的事。

大部份所謂「完整的」文化——也就是說在這文化裡生活的人們可以跟隨著一套早已確立的方式去對待自我，彼此交涉，對環境作適應——酬庸它的成員以一種我們不嚴格的說可稱之為滿意的東西，而正在崩壞中的和已經粉碎了的「文化」底特徵就是再也不能教人有「滿意」之感，它不再令它的成員感到「生命值得一活」了。於是，頭尾一倒置，這就導致了一般人對造成變遷的原始來源產生痛恨；使他們直覺的把他們的非難歸咎在一些事物上，不管他們所歸咎的在客觀上是否就真是該非難的對象。不知道是不是經過本書作者無意識的強調，我們可以發現在劉易士的這五個家庭中，「不滿」的因素也是極端明顯的。

本書不光是一個取自墨西哥的樣本，它充滿了苦痛地說明了碌碌眾生底生存狀況的一些方面；這些億萬的人們，經由同樣的科技成就突然間成了我們的近鄰，他們的善意或敵意都將被證明對我們的生存是生死攸關的。

奧利維·拉·法濟

1959年3月

謝誌

由於本書的田野工作進行一段相當長的時間，我受到許多人的恩惠。感謝美國哲學會（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1947到1948年夏天的研究贈款；福特基金行為科學部（Behavioral Sciences Division of the Ford Foundation）1952年的補助金；威內·格連人類學研究基金（Wenner-Gren Foundation for Anthropological Research）1958年夏天的研究補助。更感謝伊利諾大學研究理事會（the Graduate Research Board of the University of Illinois）自1948年來給予我的墨西哥研究以誠摯的支持，以及1948、1951、1955、1957、1958等各年對我研究所作的贈款。

我的妻子路絲（Ruth M. Lewis），對於本書的貢獻令我最為感激，她是我在墨西哥進行田野工作時無價的助手，而在寫這本書時，更給我貼切的協助。我還感謝Helen S. Kuypers為我的原稿作出完美的打字；哥倫比亞大學心理治療教授Nathan W. Ackerman、伊利諾大學教授Fred P. Ellison和Dorothy K. Bestor對我的鼓勵和對原稿的建設性批評。感謝墨西哥心理分析協會的朋友——Dr. Ramón Parres、Dr. José L. Gonzales、Dr. Santiago Ramírez、Dr. José Remus和Dr. Luis Feder——他們對於馬廷奈家的資料所作的啟發性的討論。再謝謝墨西哥藝術家Alberto

Beltrán 對本書所作的美好繪畫。

最後，我深深感激這五個家庭成員對我的信任和合作，使這件工作得以完成；為了保護他們，他們的住址和姓名都改換了。能夠認識他們真是一種極大的特權，我嘆佩他們在面對那些勢不可擋的困難時所表現的勇氣。

譯者的話

就《貧窮文化》中譯重刊與三篇導讀的贅言

三十三年前（1970）的初夏，本書譯者當時在景美軍法處看守所服第三年政治犯的刑期，剛自台大考古人類學系畢業的同班同學王志明前來會見，告知帶了一本我會欣賞的書來給我。在隔世般的時空中，歲月在牢牆內仍如同在世間般地逃逸，在我幾乎忘卻此事之際，意外的收到了被「檢查」了幾個月的《貧窮文化》（*Five Families: Mexican Case Studies in the Culture of Poverty*）。日夜讀畢，百感交集，胸中澎湃。遂決心逐譯為中文，以示不負獄中之歲月、以及難友志士生死相守的生命經驗。

三分之一世紀前的這份因緣，於我離獄五年後（1976）在方瑜、李永熾夫婦的推介下成書。當時因復學被拒而成了生意人的譯者，似乎也自以為就此了卻了一段為正義張目，為人民發聲的前業；也為自己的立身——以至於虧負了許多關愛我者的行事——做了小小的交待。

世事多厄，前緣難了；四分之一個世紀中夏林清選用此書教學，同學們皆苦於一書難求。導航的弟妹們亦期重刊譯本，以應運動與組織者自修與啟思之需，譯者因此應邀撰寫部份導讀。受命之餘，譯者悲喜交集。

譯者之所以不得不感到悽然與夫誠惶誠恐也者：老成漸去，後秀待壯；逾半百之身孤懸潮谷，只有勉力承啟，聲嘶力竭而後

已耶！

譯者之所以有以欣然快慰者，歲月流失、人心未老；赤子胸懷，仍有可能在閱讀與論詰中滋長茁壯；新一代的生命況味，亦得以相應於來自異境、基層中之真摯發聲而獲得借鑑與豐饒；他們之藉著這些發聲去感知貧困中人從而產生的同理心，或許將促生一波接一波的運動中人，於焉產造新世代的在地論詰與敘說！

這樣的得失之心，與夫恨祈之情；毋可諱言，實有感於存有中之斷裂／持續，人我間之感知／道斷的辯證與周延矣。

如此之際，重刊本書難免亟思有所作為，遂敬邀台港二地少壯共同協力撰就導讀三篇，附於書前¹：

舊譯重刊既自認非屬多餘，除將譯文重新修整、完善，以示對社會負責外，何以又畫蛇添足、增加讀者的負擔呢？

譯者當年雖自惕切勿蹈入歷來引介西方著述時的「拿來主義」覆轍，惟其時資訊有限學識不足，書前〈譯者的話〉雖已盡力；遠未足為劉易士在學潮中定位，或為讀者擴充解讀之空間；預留與閱讀主體生命歷驗相構聯的可能與想像——今日以觀、這當然明顯地受制於其時在地性論詰尚屬初啟，學界囿於「現代化」實證操作的矮化下，在地認知主體的貧乏與薄弱之「現實」！

而今，痛思首刊時之錯失，譯者遂發願重讀劉易士的全部著作，並就文獻中他生身滄桑之種種、加以抓梳、構聯，意圖突顯他生命中、處在學界險惡環境與白色政治恐怖下的堅持與創發；從而還他一個作者論與作品論上的公道。這個心願的成敗，細心的讀者在〈演敘「貧窮文化」〉一文中當有體認！？

1. 本書譯者不才，僅就導讀三做些學究功夫。導讀一及導讀二等創發部份則由青年一輩執筆。這些導讀自構思到完成，楊斐如和羅景強都在時間與精神上給予無私的支援，特此致謝。

其次，張少強在他重構「貧窮文化能是什麼」的提問下，不但暴露了香港過去在解讀上的偏執；他更將劉易士的理述和他身後的方法學新發展加以扣連；又在張少強自己進入籠屋進行田野的經驗基礎上反省；有血有肉地擴充了我人解讀的空間。

劉于甄則更切身地並置了她生身體會的經驗，就白蘭、媽媽、作為讀者的自身、作為書寫者的自己，在多重發聲的表述中深入到了劉易士（及劉易士夫人 Ruth）的異域及演敘中、進行反思與自省。有女性閱讀經驗與心理學素養的讀者難免有深得我心之嘆，感到其中緣自親暱力行的感人與迫力，令人屏止！她書寫中的類蒙太奇手法可說是大膽的實驗；識見與勇氣皆不可多得。知之者得之，毋庸多說。

贅言至此，是以為記，作為開卷之請！

譯者 丘延亮識

2003年11月10日

于香港浸會大學社會系

目次

「基進・實踐・文化」系列書序／夏林清 i

序 iii

謝誌 ix

譯者的話 xi

導讀一：說一個我讀《貧窮文化》的故事／劉于甄 1

導讀二：扣連《貧窮文化》／張少強 27

導讀三：演敘「貧窮文化」／丘延亮 57

背景 107

墨西哥鄉村的一天：馬廷奈家 129

卡撒・戈蘭大雜院：顧梅家 165

麵包匠街：戈提也家 231

墨西哥城的邊緣：桑且家 321

洛馬・得・夏布鐵別區：卡斯特羅家 409

參考書目 473

導讀一

說一個我讀《貧窮文化》的故事

——一個在地、生身的體會與異域、演敘的並置與反思

劉于甄

一、在閱讀的旅程中認識自己、貼近自己

兩年前夏林清老師在輔大心理系開的一門課——「家庭關係與個人發展」，我第一次閱讀《貧窮文化》，起初我非常關切作者究竟在表達什麼？我努力想要看懂作者的觀點與立場。然而，隨著我作為讀者所選取的主體位置越來越清晰，我開始經歷自身閱讀的矛盾。隨著閱讀的投入與情緒的累積，「我變了」也可以說「我被變了」，總之，我清楚的經驗到（也意識到）我有「我關心的主題」，於是，原先想要看懂這本書、看懂作者想要說什麼、讀出作者的「設計」……這樣的目的不見了，我的焦點被我的興趣引導。

漸漸發生在閱讀當中的是：我被召喚出來的情緒越來越打開我閱讀的眼光，我與作者之間開始發生一場鬥爭（用另一種語言表達就是：「身為讀者的我」，不再只是努力去猜測與思考作者想呈現的東西或者說是作者選取呈現這些東西的目的，我越來越激越的情緒，更有力地影響著「我的閱讀眼光」）。我的主體性閱讀位置越清晰，作者所要傳達的意旨對我而言有了不同的重要性，也就是說：在整個文本當中，我的焦點越來越聚集在引發我情緒的描述當中，不再能將所有注意力集中在思考作者的鋪陳與

目的。我當然希望在閱讀當中能從作者處得到最多的啓示與學習，這是我最初會以一種探究作者意旨的心情去閱讀的原始動機，而過程中，我大約與作者有些許共鳴（我自己的感覺），不過，最終「我選取」（更精確地說：是我還「沒有意識」也「不曾選擇」就已經帶在身上）的閱讀位置決定了我閱讀此書的學習與啓示，這樣的我（簡略標籤為：「一個台灣三十二歲的女性心理系碩士生」）有一個個人暫時性（使用暫時性是因為：**在我努力表達出我的閱讀歷程的過程當中也就是在作為「寫作這篇文章的作者」當中**，我也有了不同）選取的焦點來閱讀此書，從我過去生命經驗出發，而對於女性在婚姻與家庭中的生存處境、下階層人民如何掙扎著脫離自身被剝奪與壓迫的關切，以及心理學（例如：案主中心的同理心、精神分析……）的觀點都影響著我的閱讀。

一年半前我有幸在前公娼白蘭的身邊分享她的生命經驗，而之後又經歷了母親往生前後的情感的衝擊與矛盾。在這些經驗下再次重讀《貧窮文化》，從劉易士的文本裡巨細靡遺的田野紀錄中，我從揣摩作者想說的話，到我（本文作者）在此處說我（讀者）從文本裡抽取出帶著自身經驗而與文本交會的感動，我（讀者）積極地主體性閱讀位置在此處不是掩蓋、含糊、假裝，當然我（本文作者）的話，更不可能是包裝在客觀中立的面具底下。我（讀者與作者）赤裸呈現從我生命經驗與社會脈絡出發的閱讀經驗，是為勾引其他閱讀經驗者的對話。而期待這樣的對話是由於我帶著這樣的企圖：希望透過對話對我自身的解放產生一種刺激的作用。下面我要談在隔了兩年之後重讀這本書，我在第二次閱讀中發現：兩次閱讀經驗產生了對照作用，這樣的對照當中，我未必讀出作者多一些，反而讀出自己多一些。